

【应用经济学研究】

收入分配的效用研究

王升, 吴群琪

(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从效用角度研究收入分配,指出收入分配具有基本效用、调节效用和公益效用等三种效用。结合收入分配效用最大化理论,认为当前中国应适度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加大社会福利和公平方面的支出,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的最大效用。针对收入分配的三种效用,分别给出具体的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建议,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收入分配;效用;效率与公平;分配政策;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F0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2-0032-05

Research on the utility of revenue allocation

WANG Sheng, WU Qun q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revenue allocation from the angle of utility and points out that it has three utilities: basic utility, adjustment utility and commonweal utility.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revenue allo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ffirms that the essential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efficiency and justi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utility maximum theory of revenue allocation, it is thought that China should slow the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large the payout on social welfares and justice, which can achieve the maximum utility of revenue allocation. In the end, some concrete advices to adjust polices of revenue allocation with its three utilities are given separately, which have high implication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new era.

Key words: economics; applied economics; revenue allocation; utility; efficiency and justice; allocation policy; harmonious society

0 引言

国民收入分配指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收入在各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它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3个层面共同组成的一个复杂过程。初次分配的主体是市场,市场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再分配的主体是政府,政府按照政治上的公平原则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具体的调节政策有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第三次分配的主体是

社会,社会中个人以提供或接受赞助、捐赠等方式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调节机制功能的不足,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前2个分配层面的有益补充。

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历史悠久,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对收入分配的本质进行了深刻论述。20世纪50年代,以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建立了与经济增长紧密联系的收入分配理论,引发了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高潮^{[1]8}。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因收入分

收稿日期: 2006-12-26

基金项目: 交通部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前期规划项目(20050316)

作者简介: 王升(1970-),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工学博士研究生。

配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给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谐发展造成隐患,从而引起了理论界对收入分配的高度关注^[2 3]。

本文从效用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探讨收入分配的形成机理,分析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探讨如何调整国家收入分配政策,使收入分配的效用最大化,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和谐发展。

1 收入分配的效用

效用概念一般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或有用性。在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中,效用指人们在消费物质或劳务时所感受的满足。收入分配的效用就是市场、政府以及社会在对社会生产收入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带给个人、社会与经济的效果和影响,是收入分配的价值或有用性的体现,也是人们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成效的评价。

依据收入分配在3个分配层次中的不同目的和作用,可将收入分配的效用分为基本效用、调节效用和公益效用3个部分。

1.1 收入分配的基本效用

对于初次分配层次,收入的分配是依据市场机制进行的,按各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这时收入分配的基本效用是满足人类基本生理需要、激励生产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收入分配的基本效用包括满足生理需求的效用、激励效用和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用。

1.1.1 收入分配满足人类生理需求的效用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4],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的就是对生存的需求,需要基本的食物、居所、睡眠、繁殖等维持生存。人们用自身付出的劳动生产产品,通过市场交换以获取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个过程就是通过收入分配实现的。不论是原始人狩猎收获的猎物,还是现代人通过劳动付出获得的薪酬,都是人们获取基本生存的收入,通过收入来换取生存必需品,可以说,收入分配和人类是与生俱来的。

1.1.2 收入分配的激励效用

在市场经济中,人都是“逐利”的,在利益的驱动下采取行动,个人自利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5]。通过自由公平交换,市场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因此,拥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收入分配的大小,这就鼓励人们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争取更多更好的生产要素,以利于在市场上获取较高的收入,由此产生收入分配的激励效用。

必须说明的是,生产要素初始拥有的数量和质量由于多种原因一般是不可能相等的,按要素贡献分配必然造成收入不平等。适度的收入差距是有激励效用的,可以加剧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但过度的收入差距则导致自然垄断,造成竞争机会的不平等,引发社会矛盾,这就是“市场失灵”。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机制进行调控。

1.1.3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用

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用是不同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改革前后的对比。改革前实行的“大锅饭”就是平均分配体制,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改革后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使得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不论是李嘉图的资本积累增长论、马克思的生产分配论、近代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还是当代佩尔松、邹恒甫等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有害”、“无害”之争等理论^{[1]9},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同,但都不可否认地说明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影响的效用。

1.2 收入分配的调节效用

收入再分配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再分配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发展不稳定,体现为收入分配的调节效用。

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市场经济机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上,市场经济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对个人资源禀赋进行收入分配,但是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状况一般是不同的,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结果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最终形成“马太效应”,两极分化。不公平的竞争起点是矛盾的焦点,这一点由于市场本身是“失灵的”而无法解决。其次,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当政府实行“先发展,后分配”的战略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先投向利润导向行业,并提供优惠政策,造成行业 and 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再次,城乡的不同体制形成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的制度性障碍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一点在中国“二元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6]。最后,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导致收入的不公平。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等原因,政府“寻租行为”、“官倒”、贪污腐败等行为造成大量灰色收入,形成收入

差距,民怨极大。此外,还有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政策真空等原因,也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

消除收入差距过大不公平的矛盾,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和政策是有力的调节工具:累进税收制度,可以自动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收入越高缴税越多,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距离;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直接对低收入地区、人群进行补贴,体现国家对公民的责任,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对贫困地区公共产品的支出(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改变收入初次分配中不公平的格局,增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对经济增长也具有长远的促进作用,这方面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和重视;合理的税收制度,调整行业收入差距,财产税、遗产税等的确立,为后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从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来看,要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用,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来配合。

1.3 收入分配的公益效用

以社会赞助、捐赠等形式进行的第三次收入分配是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有力补充,具有深远的公益效用。

从理论上讲,金钱对穷人的边际效用是大于对富人的^[7],当金钱以捐赠的形式从富人手里向穷人转移时,金钱对富人的效用没有降低而对穷人的效用大大提高,依据帕累托最优理论^[8],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提高了。由此第三次收入分配的公益效用得以体现。

人道主义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标志之一。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是美国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提高。来自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信息显示,中国资助贫困失学儿童的著名公益事业——希望工程实施15年来,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约25亿元,改变了260万贫困学生的生活困难,资助援建的11266所希望小学中,80%的学校和受助生分布在西部贫困地区^[9]。希望工程所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充分显示出收入分配的公益效用。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第三次收入分配所占的比重将不断增大,收入分配的公益效用也将越来越大。

2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扩大生产性投资。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321亿元,居世界第5位,但对于13亿多人口来说,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是英国的6%,是卢森堡的4%,这说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事实上,中国人均GDP和经济结构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差距约为100年。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为1亿人^[10]。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任重而道远,要求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投资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极为迫切。

同时,由于社会矛盾加剧,公平分配收入的要求迫在眉睫。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目前体现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5,中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都远高于0.4的公认警戒线,可见中国总体收入差距过大;在城乡差别方面,1985、1990、1995、2000、2001、2002、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2.20、2.71、2.79、2.90、3.11、3.24倍。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补贴及公共产品费用,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可能达6:1。而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左右,超过2的极为罕见^[11]。可见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在全世界少有;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2002年底中国居民的个人本币储蓄存款为8.69万亿元,其中50%的储蓄存款为不足10%的人口所拥有^[12],对比1亿左右的贫困人口,贫富两极分化的态势已经形成。政府应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一行为势在必行。

可以看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一方面,“蛋糕”相对还未做大,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趋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要求公平切分“蛋糕”的要求激增,社会矛盾激化趋势严重。而国家的收入和资源是有限的,如何使分配既兼顾效率又兼顾公平,使收入分配的效用最大呢?

3 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似乎是一对相互依赖的矛盾体,相互以对方的消减为自身发展的代价。实际上,这就是收入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的悖论,效率与公平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话题。

公平分配和提高效率,不但是制定与选择收入分配政策所必须兼顾的重要原则,而且是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选择乃至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大理论问题。正如阿瑟·奥肯所言:“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取舍是社会经济中最重大的取舍,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社会政策领域受着它的困扰。我们不能同时既烤出市场效率的烧饼又平等地分享它。”^{[13] 122}厉以宁教授在论及中国目前收入分配问题时说:“一方面,贫富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对他们不运用激励机制,不给创业者以创业利润,不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就上不去。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两难境地。”“鱼”和“熊掌”真的不能兼得吗?

收入分配的理想目标是通过效率与公平的有效分配实现收入分配效用的最大化,依据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可建立收入分配的效用函数:

$$U = U(X, Y) \quad (1)$$

式中: U 为一定时期内收入分配的效用总量; X 为效率效用变量; Y 为公平效用变量。

式(1)表示收入分配的效用水平 U 可以从 X 和 Y 的不同组合中获得,由于 X 的减少必须由 Y 的增加来弥补,所以 $\Delta Y / \Delta X < 0$,即式(1)为一组向右下倾斜的无差异曲线。如果给定预算约束 $I = XP_1 + YP_2$ (其中 I 为一定时期内可供分配的收入总额, P_1 为投资效率要素的价格, P_2 为投资公平要素的价格),则必有一条无差异曲线与之相切,该切点即为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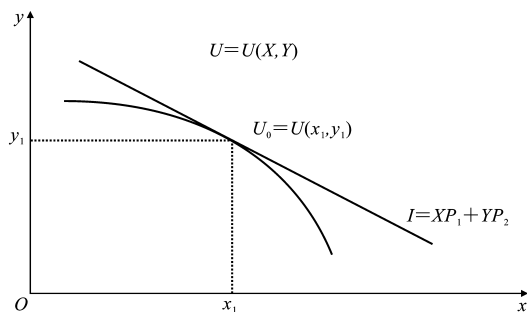


图1 收入分配的效用曲线

在图1中切点处2条曲线的斜率相等,因此有

$$\Delta Y / \Delta X = P_1 / P_2 \quad (2)$$

即 $MU_x / P_1 = MU_y / P_2$,表示当效率分配对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公平分配对收入的边际效用时,收入分配的总效用最大。

但在实际经济社会中,要做到效率与公平的边际效用绝对相等是不现实的。根据收入分配的基本效用可知,人们在不同的需求层次阶段,对效率效用和公平效用的感受是不同的。在低层次需求时自然

偏重追求效率效用,致力于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总量;随着社会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的需求层次逐渐提高,又会向公平效用的需求转移。因此,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侧重效率还是侧重公平,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应调整,不能一概而论。“在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必须牺牲一些效率。但无论哪一方做出牺牲,必得以另一方的增益为条件,或者为了获得别的有价值的社会目的。”^{[13] 124}

3 结 语

中国目前应适度减缓对经济效率方面的投入而加大对社会公平方面的投入,主要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大的贫富、城乡差距造成的社会隐患后果尤为严重,社会动荡的成本代价是任何程度的经济增长都无法弥补的。

而且中国已经连续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有必要进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整,为以后更长远、稳固的发展奠定基础。所以,中国政府应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适当减缓对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投入,扩大对广大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1)继续保持收入分配的基本效用,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不变。“减缓”主要是指国家在宏观调控上压缩建设性资金支出,而在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的原则不能变。继续发挥市场竞争的效率机制,鼓励人们努力通过合法工作、稳步经营来提高收入,多劳多得,使收入分配的生存效用和激励效用平稳提高,也就使收入分配对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了长远效用。

(2)扩大和提高收入分配的调节效用,构建和谐社会。尽快完善相关税法,实现过高收入向低收入的转移平衡,减少行业间收入差别过大的不合理现象;扩大对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直接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水利、文教、社会保障等)支出,缩小城乡竞争条件的差距,为乡镇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概括地说,用放缓经济发展来换取公平、和谐社会的建立是值得的,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冰冷的GDP,而是为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快乐、和谐与幸福。满足当今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迫切要求,这也是收入分配调节效用的最大体现。

(3)大力开发收入分配的公益效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采取抵税、奖励、表彰

等政策和形式, 大力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提倡互助道德风尚。这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受助者的生活状况, 提高全社会的福利, 还将对缓解社会矛盾产生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收入分配的公益效用对改善社会风气, 促进社会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文兴. 中国: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 王文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的变迁和思考[J] .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6(2): 24-28.

[3] 高展军, 于文祥, 杜寒芳. 城乡收入差距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J] .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3): 46-51.

[4] 马斯洛. 马斯洛人本哲学[M] . 成 明,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3.

[5] 亚当· 斯密. 国富论[M] . 唐日松,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6] 高海威.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探析[J] . 市场经济研究, 2004, 7(4): 30-31.

[7] 阿弗里德·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 廉运杰,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8] 黄有光. 福祉经济学[M] .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9] 林毅夫. 贫困、增长与平等: 中国的经验和挑战[J] . 价格与市场, 2004, 20(9): 28-29.

[10] 吴忠民. “贫富差距现状总体合理”的判断有误[N] . 中国经济时报, 2003-03-28(3).

[11] 世界银行. 共享增长的收入: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M]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12] 肖玉明. 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几个问题[J]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4, 44(3): 11-19.

[13] 阿瑟· 奥肯. 平等与效率: 巨大的权衡[M] . 康东平,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上接第 16 页)

等方面对旅客出行需求规律的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许庆斌, 荣朝和, 马 运. 运输经济学导论[M]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3.

[2] 陈贻龙, 邵振一. 运输经济学[M]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8.

[3] 胡思继. 综合运输工程学[M]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4] 严作人, 张 戎. 运输经济学[M]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3.

[5] 刘东坡. 旅客旅行时间价值分析方法研究[J] . 华东经济管理, 2003, 18(8): 155-156.

[6] 石 琼, 吴群琪. 影响私人小汽车拥有和使用的因素分析[J] .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2): 24-

29.

[7] Metz D. Travel time constraints in transport policy[J] . Transport Issue, 2001, 34(4): 99-109.

[8] 王海洋. 客货运输时间价值的确定方法研究[D] . 西安: 长安大学, 2001.

[9] 肯尼斯· 巴顿. 运输经济学[M] . 冯宗宪,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0] 林晓言, 陈有孝. 基础设施投资效果定量评价[M] .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11] 周 伟, 王选仓. 道路经济与管理[M]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8.

[12] 李林波, 吴 兵. 交通方式选择中心心理因素影响分析[J] . 山东交通学院学报, 2003, 11(9): 79-82.

[13] 赵延龙, 刘振奎. 铁路旅客旅行时间价值分析方法[J] . 兰州铁道学院学报, 1998, 40(12): 26-30.

[14] 南敬林. 京沪通道旅客行为时间价值研究[J] . 铁道经济研究, 2002, 10(3): 36-38.